

# 辛亥革命在合川

池正永 郑家槐

1898年，清政府变法维新失败后，政治上的腐朽已不可救药。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完全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公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卖国，甘当走狗。帝国主义各国则“托安全之名；行灭国之实”，通过清政府，全面加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眼见锦绣中华，江河日下，局面全非，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孙中山为首领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们感到清室腐败，非将其推翻不足以挽回危局，因此发动了多次由同盟会会员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每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成功了），但其影响却深入人心。

1911年9月，为川汉铁路收归国有问题，四川清政府逮捕了保路同志会首领蒲殿俊等人，并屠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于是由保路运动，发展到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保路同志军起义。起义烽火，迅速遍及全国，势不可当。清政府为了镇压围攻成都的保路同志军，并防止受民主思想影响的新军——陆军十七镇（相当师）哗变，乃调驻在成都的卫戍部队移驻近郊龙泉驿镇。在这个部队的同盟会会员、步兵排长夏之时<sup>①</sup>见起义时机

成熟，便与工兵排长贾雄、骑兵排长隋士杰、辎重兵排长丁扬武等秘密联络，俟机发难。此时，省同盟会派王文炳、褚啸天前来接头，告诉他湖北革命党人已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成功。夏之时闻言大喜，毅然于1911年11月5日举行起义。杀清东路军司令魏楚藩。起义军6个排230多人（后来发展到800多人），推夏之时为总指挥，夏亲手刻制“中华革命军总指挥印”出示安民。并决定去重庆与当地革命党人共图大举。起义部队经简阳、乐至、安岳、潼南，于18日进入合州境内。在这以前，合州籍同盟会员易宇昌遵照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指示，返回合州进行革命活动。他借助绅、商、学界等社会力量，以保路同志会的名义，表面上以争路为由，实则暗中进行宣传，并以组织力量、维护社会秩序的形式招募人员，组织武装力量，策略地在地方军政要员中做分化瓦解工作，为配合重庆起义作准备。与此同时，另一合州籍同盟会员黎怀瑾，早在1907年就由日本回到家乡合州，“组织会党，阴倡反清”。他曾在小沔等地秘密组织军队，待机而动。此外，州人杨思炯也曾潜回合州进行革命活动，他于1911年6月组建“保路同志军”攻打定远县（今武胜中心镇）。加上当时哥老会（即袍哥组织。在地方上人多势大）的宗旨：“反清复明，反满复汉”与同盟会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目的基本相同，他们对革命也是拥护的，这是当时合州的形势。因此当起义军到达潼南的消息传到合州后，合州即派专人携带物品银两前往欢迎和劳军。当时合州知州罗必传获悉夏军逼近梓潼镇（即潼南）以后，即柬请各界人士于次日（公元1911年11月19日）夜间在苏家街商会（今县政协住地）会议室开会。会前，会

议室外周围 已有不少身强体壮的袍哥兄弟伙，簇拥密布，卫护会场安全，其中有很多社会青年，挤身于小袍哥之间。接着罗必传与应约前来参加的地方上层人物，先后步入会场，大袍哥沙九江、朱华斋等均皆列会，会场空气，显得有些紧张。会上罗必传首先发言，声明他也是汉人，表示他并不反对革命。并说明他自宣统元年承乏州事以来，毫无政绩可言，至感内疚，但他一直是热爱地方、尊重地方，没有苛扰过地方百姓，也没有简慢过地方名流，希望大家原谅他，体恤他，保障他的安全。说到此处，竟由颤声而哽咽，终于泣不成声。会场满座，面面相觑，默不发言。最后，沙九江大爷猛然站起来向着罗必传说：“只要你不反对革命，我们也不会加害于你”。说完带着征询的目光向会场环视一周。朱华斋、朱玉斋两位大爷，首先举手表示同意，其他与会人士，也有气无力地随声附和。就这样由几位掌旗大爷率领守候会场的袍哥兄弟伙簇拥着罗必传走出会场，且走且扬言，不要罗必传留居州署，把他送往离城70里的白峡口去看管。尾缀其后的群众，因被软劝硬压，被堵截于苏家街、申明亭一带，满怀愤怒地目送他们向北门方向而去。驻城守备队，也由队长何魁神率领，于当夜离城匿避。

1911年11月18日，夏之时率领的起义部队由潼南进入合州境内，受到合州专门派去迎接的合州商会总理白治安一行的热烈欢迎。白治安向夏之时转达了合州老百姓对起义军的敬意并转交劳军银两和物品，夏之时代表起义部队欣然接受。在这次会见中，夏之时嘱白回州树起反清旗帜，组建军政府并口头委任白治安为合州军政府司令官（1912年3月29日报端公布重庆镇抚府区域及现任地方司令官表，其中，合

州司令官白治安名列表内)。

11月20日晨，不期而会的青年20余人，齐由洛阳门出城，希望一睹起义军的军容。行至大山坡，迎面望见夏军先头部队约二、三十人，皆身着新军衣帽，肩扛“五指钢针”洋枪，问明青年们的来意后，告诉夏总指挥已乘船起程来了，请青年们引导他们进城安置各道城门岗哨，随后去涪江江岸迎候夏军到来。此时，江岸已架立张采篷帐，设置香案茶几，地方著名上层人士和袍哥大爷，皆肃衣鹄立篷帐之内。篷帐外围，挤满旁观群众。不一会，遥见上游乌木滩江心，有一艘大船顺江而来，南北两岸各有护卫队士兵二、三十人沿岸扈从。船抵迎军江岸后，即停靠于距岸约三、四丈远之江心，两岸扈从武装，遥对军船，分别警戒。入城把守各道城门的先头部队，也陆续来到江岸参加岗哨。当军船定位以后，夏之时着新军军官服装，出舱站立船头。四个头缠青布，身着黑色短袄靠的彪形卫士，手执雪亮钢刀侍立左右，舱口露出大炮炮筒，上盖炮衣。舱内挤满了着新军军服的士兵，抱枪而坐。其军容之森严，与州署守备队旧军相比，相距天渊。这一形象，在青年们眼中，至堪钦佩；在地方上层人士眼中，又有些惊愕可畏。夏传令迎军人员上船，迎军群众中，仍推选前去劳军的白治安代表州人上船谒见。白上船后向夏之时施礼，立谈不到半小时，即兴辞返岸，军船随即起碇转嘉陵江向重庆方向东下。岸上士兵及后续大部队也分别乘白治安等早已准备好的木船尾随其后。夏之时在船开动时高声向岸上的白治安说：“我委你是合州司令官，你今后遇到什么问题 and 困难，可以直接写信告诉我”。显然这是有意向迎军的人士表明他对白治安的口头委任。

白治安回城后，罗必传已回踞州署。这时州人才明白，昨夜罗必传即住在朱华斋、朱玉斋早在北门外为之安排好的秘密住所，其扬言送罗赴白峡口的话，实为转移民众视听而避免引起外界对罗麻烦。由此看出当时地方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少部份人态度暧昧，对革命存在疑虑。白治安的儿子白卓孚早与同盟会员易宇昌有往来，思想进步，拥护革命，见此情况，愤怒难平，率领赞成共和的青年多人，冲入州府，向罗夺取州印，宣布合州独立。后来通过各方面商量，准许罗必传暂时担任合州行政官，属于合州司令官之下，以便在过渡时期，不疏政务，顺利地推行地方行政（不久罗即去职）。

罗必传交印，清王朝在合州驻军防汛汛署把总孙朝宗，返回陕西老家。这标志着清王朝在合州统治的结束。由同盟会领导的、哥老会及绅商各界支持的白治安，在合州办了几件事。

## 一、组建军政府。

军政府设司令官，由白治安担任。下设

保卫营：保卫营设总管带一员；下分二队，设队长二员；队下再分为五营，设营长五员，各统兵百人；后又添入警察、警备两营，共计七营，有兵七百人。原巡防队一百二十人并入保卫营。

军需官：一员。筹集薪饷银三万八千余两。其中：经征、百货两局出银一万七千余两，盐项下一万一千余两，附加税八千七百余两。

文牒长：一员。

差遣官：二员。

财政部：部长一员，由同盟会员胡南先担任。

行政官（民国元年改为司法科）：一员。由原知州罗必传担任。

## 二、维护城乡治安。

保卫营成立后的主要职责是防止其他县的清军进攻，再就是维护城乡治安。白卓孚每晚都必须亲自去城墙上巡察。在此期间合州未出现大的治安事故。

## 三、作好宣传工作。

合州反正后，白治安及其子白卓孚，在民众中加强革命宣传工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合川民众开会热烈庆祝，会后，整队游行，合州司令官白治安骑马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商会护商队的武装，由队长孙海全率领，紧跟白治安马后，显得威风十足。游行队伍和看游行的群众，情绪都很热烈。

## 四、倡立新风气。

辛亥革命前，清王朝在合州的知州，老百姓称为“大老爷”，府官及其以上称为“大人”。辛亥革命后，根据孙中山先生官吏是国民的公仆的教导，统统改称“先生”。对祭祀文庙、武庙时，由原来的行跪拜礼，改为行三鞠躬礼。胡南先带头剪去发辫，白卓孚亲自带人在北门、东水门等交通要道，要进出城门的民众剪去发辫。

1912年5月 四川军政府派林肇开为合州知事，白治安

办理移交。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在合川的革命活动，至此告一段落，中华民国的历史，从此伊始。

注：

①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省合江县人，在中学读书时，就受到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教师皮香泉、范达尊、范斗东等的影响和熏陶，思想进步很快。二十世纪初，怀着救国图强的愿望，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斌学堂，专习军事。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在东斌学堂学成回国后，即参加新军十七镇，任步兵排长。

1911年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龙泉驿起义后，20日经合州东下重庆，21日抵达江北黄桷树。重庆革命党人杨庶堪等闻讯大喜，即派朱之洪、黄崇麟等前往迎接。夏部到重庆后，党人杨庶堪、张培爵、谢持等，倍感革命力量大增，立即召集同盟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以革命武装为后盾，采取和平方式迫使川东道朱有基、重庆知府纽传善和巴县知县段荣嘉等缴印投降。1911年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1912年3月11日，成都、重庆两军政府正式合并，统称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改为“重庆镇抚府”，夏之时任总长。不久夏辞职再度赴日本留学，1917年回国，参加北伐，被孙中山委任为“靖国招讨军司令”，由唐继尧拨滇军一团交夏率领入川，驻防合江、璧山等地。1919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改编部队，夏交出军队任文职。1920年，吕超任川滇黔军副总司令兼四川总司令，邀夏之时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不久去职，从此

不再介入军界，专门从事教育。1950年10月病逝合江，终年63岁。

② 易宇昌（1889——1966），合川县大石乡人，出身地主家庭，有兄弟二人，兄名易宇修。易宇昌先后在合川县中、重庆川东师范毕业。1909年，值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大力宣传革命，在国内外积极发展组织，多次发动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易宇昌赞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在重庆由朱之洪等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认识了老同盟会员石青阳。他们志同道合，交结甚深，后来跟随他参加了抗议清王朝丧权辱国，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川汉铁路主权的四川“保路运动”。1911年，易宇昌遵照同盟会重庆支部指示，返回合州秘密进行革命宣传，为配合重庆起义作准备。1911年11月22日，重庆起义，一举成功，成立了“蜀军政府”，易宇昌于1912年元月由合州去渝任该府秘书厅科员，以后先后从事教育及军政等工作。由于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加之好友石青阳去世，决心不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出力，于1937年回到老家合川，从此不问国事。解放后，政府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于1950年3月，邀请他参加“合川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安排他作常务副主席。以后先后担任川东行署委员、川东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川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5月因病逝世，终年77岁。

③ 黎怀瑾，字待聘，一字子瑜，合川人，前清廪、贡生，1906年去日本留学，当年参加了同盟会，1907年回国。回国后，在河北省策动保定新军反清无效，返家乡合川创黎

氏家学。在此期间，秘密“联络会党，阴倡反清”，后被地方官府追捕，隐名潜入湖北宜昌川汉铁路公司。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初，他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准备西上四川援助同盟会起义，后被人告密，在当时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被捕牺牲。

④ 白治安（1870——1924）字炳煊，四川荣山人，生三子一女。长子恒富，字善祥；次子恒先，字卓孚；老三恒生，字兆南；女素琼。白治安青年时来合州学徒，日渐发迹，在合州商界崭露头角。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川东商务总会批准州人白人和等筹建合州商务分会，经三年时间，于宣统元年（1909年）筹备就绪。合川商务分会正式成立，选白治安为总理。1911年11月20日，起义军排长，后为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路过合州时，口头委任白治安为合州司令官（后被正式委任），取代了清王朝最后一个州官罗必传，掌管合州军政大权。据白治安女儿白素琼（现年66岁）说，她听她母亲说，她父亲在合州反正前后，工作繁忙，经常深夜才回家来。到家里来找他谈事的人也很多。1912年5月，四川军政府委任林肇开为合州知事，白治安办理移交。在半年的过渡时期中，合州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此白治安之贡献。

⑤ 白卓孚，合川县人，白治安次子，成都通省师范毕业，毕业回合州后，在合州税务局当一名职员，常与社会劳动群众交朋友，相识极广。据白卓孚遗腹子白崇仁（又名敦能，久长街小学退休教师，现年75岁）说：“我母亲告诉我，辛亥革命合州反正时，我父亲见罗必传推而不倒，十分愤怒，他约聚数十青年，用青布包一大鹅卵石充作炸弹冲入

# 中央土改团在合川参加土改纪实

杨 联 欧

合川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土改于1951年6月在一（东渡、南津）、二（盐井）、四（云门）、五（利泽）、六（涪沱）等5个区的34个乡所辖的383个村展开。担负这次土改任务的工作干部700余人，其中川东区党委工作队300人，本地县、区、乡脱产干部400余人；中央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川东队（以下简称西南土改团）来合川

---

州衙扬言如果罗必传不把州印交出来，就是这颗炸弹，送他回老家去。罗必传不敢违抗，恭恭敬敬把州印捧出来。以后，父亲他们又组织青年人到处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理，并在城门口给进出城门的群众剪发辮”。1913年，四川政局发生了变化，重庆被立宪派人篡夺了政权，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及参加反正的积极分子。1914年白卓孚奉他父亲之命到重庆办事，被人告密，惨遭杀害。

后记：本文曾参阅《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新修合川县志集刊》、《四川保路风云录》、《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合川县商业志》、《重庆大事记》等书刊，以及合州商会成立时之石碑实物及碑文，并去成都查阅易宇昌档案，访问白治安家属、亲友等。由于事隔七十九年，如有遗漏或错误之处，请读者赐教。

参加了这一期土改工作。

西南土改团川东队从北京到合川参加土改，这是我县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件重大史事，也是我党建国后实行多党合作的重要史实。

笔者就当时西南土改团在合川的往事追记如下：

西南土改团共99人，于1951年5月17日由北京到达重庆，在渝学习半个月后，即组成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工作队，分赴各地参加土改工作。川东队由西南土改团团团长章乃器先生直接率领，于6月6日来到合川。这个队26人，其中女性1人，平均年龄52岁，是全团4个队中年龄最高的1个队。队员中有全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有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有工商业者；有宗教界人士；有科学家、教授、专家、政府工作人员及文教工作者。

他们到达合川后，先参加了中共合川县委举办的农民土改训练班学习。6月12日农训班结束，合川县第一期土改工作正式开始。6月14日，土改团川东队的全体队员步行（其中1人骑马，1人坐滑杆）到了第四区所在地云门镇，遵循土改的统一步骤，直接参加了云门乡和天星乡的土改工作。直到8月17日，农民开了庆祝土改胜利大会后，全体队员才离开合川。

## 一、土改前的思想准备

西南土改团的全体成员，绝大多数是民主党派的同志，是与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对于我党实施土地改革的政策是拥护的，能到农村直接参加土改工作的心情是愉快的，但他们对土改运动的具体作法，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入川

后在重庆及到了合川，均专门进行了学习作思想准备。在学习中，先取得了以下认识：

1、明确了土改工作团这次的任务是支援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在这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中获得考验和教育，以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想法。批判了以改良主义为根源的“和平分田”的错误想法，承认土改必须以斗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

2、明确了自己的立场是拥护《共同纲领》的革命人民的立场，土改是实行《共同纲领》中的土地政策。地主阶级是农民阶级的直接敌人，也是四个阶级的共同敌人。

3、明确认识了西南地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极端残酷的。土改前先进行减租、退押运动，惩治不法地主是理所当然的。

4、认识了什么是正确地执行政策和什么是偏差。不依靠贫雇农，不团结中农，就脱离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必须从阶级观点去理解合理是合什么人的理？合法是合什么人的法？必须从正确的观点去判断正常与偏差，要在不影响农民革命情绪的条件下，及时地尽力纠正偏差。

## 二、土改团对农村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土改团的同志深入到乡村，与农民群众接触后调查论证：在合川第四区的农村，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主要表现在地租和押佃（即佃金）上。地租和押佃是套在农民身上最残酷、最沉重的锁链。农民被地主不断地剥削，最后变成了“干人”（穷苦农民的通称）。农村流行一首很广的民谣：“干人头上三把刀，重租厚利押佃高。”再加上暗无

天日的政治压迫，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况是数不清、说不完的。田租（即租谷）一般要占常年稻谷产量的八成，甚至有高到十成即所谓“满租”的，这在全国可说是“无出其右”的了。租的种类有定租、活租、预租、附加租、力租、挂红租、豆租、谷草租等。名目之多，也堪称全国第一。定租通称铁板租，其方式就是在佃契上写明：“不论天灾水旱，不准短少升合，如有短欠，扣除押金”。预租就是在租佃田土的时候，先收当年地租的全部或一部。地主收了预租又反过来作为高利贷贷出，从春荒到秋收，要收50%的实物利息，就等于农民多交50%的地租。豆租就是农民在田坎上种黄豆、绿豆等，也要向地主交租。地主加租是无限制的，要加便加，一年加一次租是通常的，也有一年加两次的。

“无押不成佃”，这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也是在租佃关系中最突出的剥削方式。首次交纳押佃，往往值所租田土常年产量的半数以上。据农民控诉：一年加一次押佃是通常的，也有一年加两次的。押佃之外还要保人，请保人要送礼，换保人必须换佃契，换佃契就得请客。云门乡十一村一个地主在一年之中要一个姓刘的农民换了三次保人，花费的钱达押佃的半数，弄得他走投无路。

重租与高押又是相连的，地主明知租重农民交不起，于是要求高押，一遇年成欠收，农民以全部收获交租都不够，只好听凭地主扣除押佃。原交的押佃扣完了，下一步的剥削又是加押。农民无力交付加押，就只好借高利贷了。于是重租、高押、高利贷三把刀，就可以循环交错地宰割农民。

地主阶级为了剥削而控制农民的手段还表现在：地主出

租的土地都有供给佃户居住的房屋，农民佃不到田，就无房屋居住，夺了佃，也等于夺去了房屋。所以地主阶级不但垄断了农村的土地、同时也垄断了农村的房屋，这就完全控制了农民的命运。

在农村，不但天灾的损害全部由农民负担，连国民党政府对土地增加的负担，甚至保甲的临时摊派，都要用加租加押等名目，转嫁给农民；还有法币贬值的灾祸。最后也落到农民头上。农民以法币交的押佃，交时可值几十石黄谷，到最后结算，只能买几升黄谷的例子很多。

调查表明，合川第四区的农村，地主剥削农民特别严重。他们通过高度的剥削，逐渐集中了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又支持了高度的剥削。由于对土地的高度剥削，又诱使城市资金，甚至官僚资本大量投放农村购买土地，促使土地更加高度集中，从而再加重了高度剥削。这一恶性循环，直接受害的还是农民。天星乡第三村，地主27户，131人，占总人口8%强，占有土地3821石，占该村总面积的78.6%。全村贫雇农及中农共321户，1356人，占总人口85.4%，只占有土地505石，仅占总面积的10.4%。因此，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结成了世世代代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 三、土改工作经过

第四区云门乡与天星乡的土改工作，是按合川县第一期土改的统一步骤进行的。西南土改团川东队的26人，分配在云门乡六、十一、十二3个村和天星乡的二、三、四、六4个村协助工作。

6月14日至17日，工作干部下乡、下村，宣传土改，宣

传政策，稳定中农、富农的思想，召开贫雇农会，发现积极分子，了解农会领导成分，选举贫雇农代表参加第四区全区的贫雇农代表会议。

6月18日至23日，区里召开贫雇农代表、农民代表大会，启发农民诉苦，进行“谁养活谁？”、“为什么要受穷？”、“土地还老家”等阶级教育。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交待土改政策，分组讨论订出工作计划。

6月24日至29日，代表回村后，先召开贫雇农会，继召开农协会会员大会，传达区农民代表大会决议，展开土改工作。由工作干部讲明为什么要搞土地改革？对农协会员进行阶级教育，然后分组座谈，找穷因、挖苦根。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转入大会控诉，召开诉苦大会。同时整顿农会，加强队伍，向不法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打垮封建势力，建立农村人民政权。

6月30日至7月4日，划阶级、定成分，征收，没收土地，宣布地主阶级死亡，命令地主听候处理，追究违法地主应赔偿的果实。

7月5日至11日，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进行内部教育，讨论查田评产办法，提出“一人瞒产 大家吃亏”、“打倒自私自利、反对互相包庇”、“对事不对人”等口号。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贫雇农为领导，事情要办好，报实田石，评实产量。

7月12日至17日，分配土地，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进行“富村帮穷村，大家齐翻身”，公平合理，互相尊让的教育后，讨论土地分配办法。

7月18日，开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烧红契。宣布土改结

束，订立爱国生产公约。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步骤，正确的执行了土改政策。但由于群众发动还不够充分，地主阶级中的死硬分子还没有彻底打垮。川东区党委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决定延长土改期限，进行“加工”，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阶级，整个土改工作，按原计划延长了一个月，到8月17日才全部结束。

## 四、土改团成员感到的收获

### 1、锻炼了阶级立场

从政治上说，我们拥护《共同纲领》，积极地参加了土改工作，已经站稳了立场；但从思想意识上说，站稳立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生活在旧社会，又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对于社会下层的情况是隔膜的。对于最低层革命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容易不够关心的。因此，尽管自己在主观上要求站稳立场，思想意识的飘浮会使自己的立场在斗争激烈的关头发生动摇。这次参加到了群众的革命斗争里去，接受锻炼，我们的立场才真正地稳立下来。在这里还使我们体会到阶级斗争的确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发展生产力则是历史上一切阶级斗争的目的与结果。我们看到了经过减租退押斗争以后的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经提高了，当然更大的发展还要在土改以后。在庆功大会上，农民们已纷纷表示，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一定要增加生产。

### 2、加强了群众观点

我们一到合川，在农训班学习的小组讨论会上，看到全班700多人中，多数农民对土改政策法规都能掌握要点，说

得入情入理。谈到实际问题也能提供很好的意见和解决办法，我们才开始认识到农民的智慧。例如在查田评产阶段，我们队员中的工程专家说：“查实云门、天星两乡田亩的面积，并评定其产量这一巨大工作，要叫我们工程师来做，恐怕要费一年以上的工夫，但农民群众三天就做完了。”又如分配土地的时候，某些工作干部自己作主，便会发生错误和纠纷，结果仍由群众自己来处理，才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因此，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深深感到自己的渺小。那种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意识是要不得的。由于我们相信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认识到自己要不断地向群众学习，一切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 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在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少的。土改运动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政策和正确的领导，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作为参加土改工作的我们，一旦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迷失方向。

对于如何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体会是：在工作中，执行命令必须毫不迟疑，但在事前讨论、布置工作和事后检查工作，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讨论的精神，并以虚心的态度结合负责精神，才有利于一面改造自己，同时又能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中共三十年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已经初步表现出建国的好成绩，这种成就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辉煌的。我们在这种认识下，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必然的，这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改造是有益的。同时我们还认识到，为着更好地接受